

责任编辑：陈 馥
装帧设计：柳成荫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五卷）

Liefu Tuoersitai Wenj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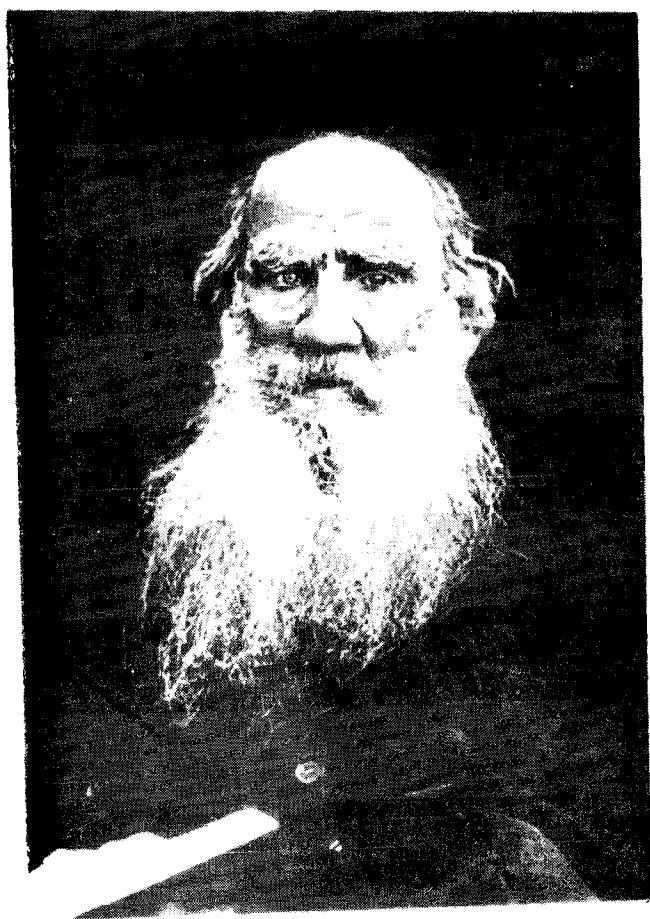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437,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9\frac{5}{8}$ 插页 5

198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8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950

ISBN 7-02-000857-7/I·858 定价 7.80 元



作者像

目 次

论婚姻和妇女的天职	冯增义译 (1)
忏悔录(又名《未出版文集的序言》)	冯增义译 (4)
中国的贤哲	倪蕊琴译 (71)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宋大图译 (77)
论生命	倪蕊琴译 (288)
给罗曼·罗兰的一封信	宋大图译 (308)
天国就在你们心里(又名《基督教不是神学, 而是对于生活的崭新理解》)	曹国维译 (318)
当代的奴隶制度	刁绍华译 (398)
不可杀人	章海陵译 (460)
论末世	陈 馥译 (468)
小绿棒	陈建华译 (508)
给一个中国人的信	朱春荣译 (519)
到底怎么办?	倪蕊琴译 (530)
论俄国革命的意义	宋大图译 (539)
我不能沉默	张孟恢译 (591)
生活的道路	丁吉平译 (608)
题解	倪蕊琴等 (614)

论婚姻和妇女的天职

屠格涅夫先生企图使人相信，阿乌埃尔巴赫先生和其他欧洲的和我们的思想家一起，正在深入研究神秘的婚姻问题的全部难以解决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与一个想一下子吃完两顿或十顿饭的人的营养问题的复杂性完全一样。谁想一口气吃掉两顿饭，他就连一顿饭的营养都吸收不了。他将把胃弄坏，因而目的——营养的结果——也就无法实现。谁想和两三个人结婚，他就连一个家庭都不会有。婚姻的结果是生儿养女。如同在生理上需要空气和阳光一般，儿女在道德领域需要有家庭生活和睦一致的父母的影响。如果有两三个父母，家庭的和睦一致便不可能。不成对的雄性和雌性动物会互相咬斗、残杀。对于人来说，如果不是专制制度，这种情况是不可思议的（如同折磨牡马，把它们严格地隔绝起来；也象东方禁锢妻妾一样）。谁注意到了婚姻的必然后果——生儿养女是它的目的，他就不会承认不一致的婚姻。谁要是只看到性行为而不顾其后果，那么他就会在我们社会的伤风败俗的机构中获得完全的满足。

“为什么呢？”屈尊俯读拙著似乎以示对我嘉奖的那些可爱的夫人带着隐含嘲弄、但仍妩媚亲切的微笑（表示她可以把我驳斥得体无完肤，只是不屑于这样做而已）对我说：“亲爱的伯爵，一位贤慧的母亲为什么就不应该梳妆打扮？妇女永远应该关心自己的外表，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出入社交界，行善积德，甚至

为僧侣和饥民操劳，同时又出色地教育自己孩子的母亲呢？”杂文评论家会说：“作者根据自己特有的逻辑（当艺术家涉足我们的思维领域的时候，他永远说蠢话）以为妇女的职责是生养和教育孩子，他由于孤陋寡闻而对最新的社会科学有关妇女职责的研究一无所知，忽略了对难以解决的婚姻问题的深入探讨……等等。”我可以一起回答这两种人，尽管我厌恶论证性的文章，但我决不放弃说明在妇女天职方面使我与大家意见相左的那些原因。

人的尊严不在于他具有无论何种品格和知识，而仅仅在于完成自己的天职。男人的天职是做人类社会蜂房的工蜂，那是无限多样化的；而母亲的天职呢，没有她们便不可能繁衍后代，这是唯一确定无疑的。虽然如此，妇女还是常常看不到这一使命，而选择虚假的，即其他的使命。妇女的尊严就在于理解自己的使命。理解了自己使命的妇女不可能把自己局限于生蛋。她越深入理解，这一使命便越能占有她的全部身心，而且被她感到难以穷尽。这一使命的重要性和无限性，以及它只能在一夫一妻的形式（即过去和现在生活着的人称之为家庭的形式）下才能实现，对此不能理解的只是那些瞎了眼而看不见的人。因而一个妇女为了献身于母亲的天职而抛弃个人的追求越多，她就越完美。

“可是，亲爱的伯爵，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教养有素的孩子，而他们的母亲是社会的骄傲呢？为什么有思想，有文化修养的妇女能象为了照看幼儿而抛弃了科学和艺术的妇女一样教育好孩子呢？”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向人们裸露肩背和写作文章的母亲的孩子和来不及梳洗打扮的母亲的孩子一样，无论在体力上或道德方面，穿着打扮上都很好。但我们看不到一些已经死去和

还活着的孩子，我们无法比较在这些孩子身上的基本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不能以希腊语法，外语和舞蹈的知识来衡量的。

这些精神力量永远在那些不与僧侣打交道，不研究政治经济学，也不用脂粉涂抹裸露的胸脯的母亲教育出来的孩子一边。

“可是，归根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亲爱的伯爵？”

这就是不务正业的艺术家的怪问题。为什么？原因是，如果母亲的使命（我以为是最崇高的）在对其深入理解的情况下具有一切真正的人类使命的特点——在想象中异常困难，由于人本身的软弱几乎无法完成（艺术、科学在男人的想象中便是如此），如果（被大家公认的）母亲的本能比理智具有更强大的影响，那么就不能设想，较多的有目标的努力会比较少的努力产生更小或更坏的后果。如果我从窗户里看到两个庄稼人在翻地，其中一个不停地在耕作，而另一个在抽烟，唱着动听的歌，和来往的行人交谈，摆出一副优美的姿态，那么我敢断定，那个不停地在耕作的庄稼人，虽然汗流浹背，劳累不堪，一定耕作得多又好。

母亲积极地爱，爱得越深，孩子便越美好。

我从伟人的传记中还没有见到一个实例说明，哪个伟人不是母亲的宠儿。

（1868）

冯增义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

忏悔录

(未出版文集的序言)

一

我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和教育。从童年开始，连同整个青少年时期，人们一直以这种教义对我进行教育。可是当我十八岁，念完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对教给我的一切都不相信了。

现在回忆起来，我从来也没有真正相信过，只不过对教给我的一切和成人在我面前的说教有一种信任的态度而已，但这种信任是很不牢固的。

我记得，我十一岁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他早已去世），叫沃洛坚卡·M，是个中学生，星期日到我们家来，把学校里的新发现作为一件特大新闻向我们宣传。这新发现就是：上帝是没有的，教给我们的全是无稽之谈（这发生在1838年）。我记得，几个哥哥对这件新闻很感兴趣，他们也叫我一起议论。我记得，我们大家非常兴奋，把它当作一件十分有趣和完全可能的事。

我还记得，我哥哥德米特里在念大学的时候，突然以其性格中特有的激情，一心一意信起教来，并开始参加一切礼拜，吃斋，过着清白而高尚的生活。于是我们大家，甚至年长的人，都不断地嘲笑他，而且不知为什么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诺亚。我记得，那时的喀山大学督学穆辛—普希金经常邀请我们到他家参加舞

会，他曾多次用大卫在方舟前面也跳过舞来劝说拒绝参加舞会的哥哥。当时我对年长的人开的这种玩笑是支持的，还由此得出结论：教义要背，教堂也应该去，但把这一切看得太认真则大可不必。我还记得，我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读过伏尔泰的作品，他的冷嘲热讽不仅没有使我愤怒，反而使我非常高兴。

我脱离了宗教，受过我们这类教育的人过去和现在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多数情况是这样的：他们和大家一样生活着，而大家的生活原则不仅与教义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多半与之对立。教义不参与生活，人们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永远不会与它发生关系，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来不按教义行事。这种教义在某个远离生活、独立于生活之外的地方被信奉着，如果与它有一点关系的话，那也不过是把它当作一种表面的、与生活没有联系的现象。

根据一个人的生活，他的事业，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前，都不能断定他是否信教。如果说，公开信奉正教与不信教的人还有所不同的话，那也并不对前者有利。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前，公开推崇和信奉正教的大都是一些愚蠢而残酷，既无道德又自以为是了不起的人。自称不信教的倒大多是一些聪明、诚实、坦率、善良、高尚的人。

小学讲授教义问答，并且让学生上教堂。官吏得交出圣餐的证明。但现在（过去则更多），我们这类人，由于不再学习，又不出任公职，可以生活几十年而从来也不想到自己生活在基督徒中间，还自称是正教信徒。

因此，无论现在或过去，由于信赖而被接受并由外部压力支持着的教义，在与其对立的知识和生活经验的影响下逐渐消失，可是一个人在往往活得很久，自以为还完整地保持着童年时代接

受的教义，实际上它早就踪影全无了。

C 聪明而又真诚，他告诉我他怎么会不信教的。他大约已经二十六岁，有一次狩猎宿夜，按照自小养成的习惯开始做晚祷。和他一起去打猎的哥哥躺在草堆上看着他。当 C 做完了晚祷，准备睡觉的时候，他的哥哥对他说：“你还一直这样做吗？”后来他们俩也没有再谈下去。从此以后，C 就不再做祷告和上教堂了。他就这样三十年不做祷告，不领圣餐，而且也不上教堂。并非因为他知道了哥哥的信念，同意他的观点，也不是因为他心里已经作出某种决定，只是因为哥哥讲的这句话好象一个指头向一堵由于本身的重压快要倒塌的墙上戳了一下，它指明了他原来以为被信仰占据的地方已经一无所有，因而他做祷告时的祷词、画十字、行礼膜拜等等完全是毫无意义的举动。他一旦了解这一点之后，便不会再这样做了。

我想，过去和现在的大多数人都是如此。我指的是具有我们这种教养的人，指表里如一的人，而不是指把信仰的对象当作猎取眼前利益的手段的那些人（那些人最不相信宗教，因为既然宗教对他们来说是满足某种生活需要的手段，那么这就已经不是宗教了）。具有我们这种教养的这些人的处境，就象一幢虚假的大楼在知识和生活的阳光照耀下溶化了一样，他们有的已经发觉这一点，并把它清除掉了，有的还没有看到这一点。

和其他人一样，童年时代教给我们的教义在我头脑中消失了，只有一点差别：由于我很早就开始大量阅读和思考问题，我对教义的否定早就是自觉的。我从十六岁开始不作祷告，自己主动不上教堂，不作斋戒祈祷。我不再相信小时候教给我的一切，但我总还有某种信仰。究竟我信仰什么，那我是怎么也讲不清楚的。我也相信上帝，或者更确切些说，我不否定上帝，究竟

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我也讲不清楚。我也不否定基督和他的学说，而这些学说的实质是什么，我同样讲不清楚。

现在，回忆那段时间，我看得很清楚，我的信仰，即除了动物本能之外推动我生活的力量，也即那时我的唯一的信仰，是信仰完善。但是完善的本质，它的目的，我讲不清楚。我努力在智力方面完善自己，我什么都学，只要我力所能及，只要生活促使我这样做。我努力完善自己的意志——制定我努力遵守的准则，体力上完善自己，做各式各样的体操，锻炼体力和灵活性，通过艰难困苦来培养自己的韧性和耐力。我认为这一切都属于完善。最根本的当然是道德的完善，但不久它就被一般的完善所代替，即不是希望在自己或上帝面前，而是希望在别人面前表现得更好些，而且很快这种愿望又被想比别人强些的愿望所代替，即要比别人更有名，更重要，更富有。

二

有机会我要讲一讲我的生活史，我青年时代十年的生活史既感人，又有教益。我看，许许多多人都同样的体验。我真心诚意想做一个好人，但我年轻，有多种欲望。当我追求美好的东西时，我茕茕一身，十分孤单。每当我企图表现出构成我最真诚的希望的那一切，即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遇到的是轻蔑和嘲笑；而只要我迷恋于卑劣的情欲，别人便来称赞我，鼓励我。虚荣、权欲、自私、淫欲、骄傲、愤怒、报复——所有这一切都受到尊敬。沉湎于这些欲望，我就象一个成年人了，我便感觉到别人对我是满意的。那位抚养过我的善良的姑妈，一个非常纯洁的人，老是对我说，她最希望我与有夫之妇发生关系，“Rien ne forme

un jeune homme comme une liaison avec une femme comme il faut”^①。她希望我还能得到另一种幸福，即成为副官，最好是皇帝的副官。而最大的幸福是我和一位非常富有的姑娘结婚，并因此而获得奴隶，越多越好。

想到这几年，我不能不感到可怕、厌恶和内心的痛苦。在打仗的时候我杀过人，为了置人于死地而挑起决斗。我赌博，挥霍，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处罚他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吹牛撒谎，欺骗偷盗、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杀人……没有一种罪行我没有干过，为此我得到夸奖，我的同辈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是一个道德比较高尚的人。

我这样过了十年。

当时我出于虚荣、自私和骄傲开始写作。在写作中我的所作所为与生活中完全相同。为了猎取名利（这是我写作的目的），我必须把美隐蔽起来，而去表现丑。我就是这样做的。有多少次我在作品中以淡漠，甚至轻微的讽刺作掩护，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构成我的生活目标的对善良的追求隐蔽起来。而且我达到了目的，大家都称赞我。

我二十六岁于战争结束后回到彼得堡^②，和作家们有了来往。他们把我当作自己人，奉承我。转眼之间，我与之接近的那些作家所特有的生活观被我接受了，而且完全抹掉了我身上原有的想变得好一些的任何打算。这些观点为我的放荡生活提供理论并为之辩护。

这些人——我在创作上的同行的人生观是：生命总是向前

① 法语：“没有什么能比与一个体面的妇女发生关系更能使年轻人有教养的了。”

② 一八五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托尔斯泰于克里木战争结束后来彼得堡。

发展的，我们这些有见地的人是这种发展的主要参加者，而在有见地的人中间，最有影响的要算我们——艺术家、诗人。我们的职责是教育人。为了不给自己提出一个合乎自然的问题：“我知道什么，能教人什么？”就说这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不必追究，艺术家和诗人是在不知不觉间教育人。我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艺术家和诗人，因此我接受这种理论是很自然的。我是艺术家，诗人，我写作，教育别人，连自己也不知道教的是什么。为此人家付给我钱，我食有佳肴，住有高楼，美女作伴，高朋满座，名满天下。由此可见，我所教的一切都是非常好的。

相信诗的意义和生命的发展是一种信仰，我曾为之献身。为它献身是非常有利和愉快的。我依靠这一信仰生活了很久，并不怀疑它的正确性。可是这样生活到第二年，特别是第三年，我就开始怀疑这一信仰的正确性，并开始研究它了。使我怀疑的第一个原因是，我发现献身于这一信仰的人并不都一致。一些人说：我们是最好的和有益的导师，我们教的东西都有用，而别人教得不对。另一些人则说：我们才是真正的导师，你们教得不对。他们又吵又闹，互相指责，勾心斗角。除此以外，他们当中许多人根本不关心谁是谁非，只想利用写作达到自己的自私的目的。这一切都使我怀疑我们的信仰的正确性。

另外，由于怀疑作家的信仰的正确性，我更加注意观察献身于创作的人，并且确信，几乎所有献身于这一信仰的人，即作家，都是不道德的人，而且大部分是坏人，性格猥琐，比我以前放荡不羁和当军人的时候见到的要低下得多。但是他们很自信，自我欣赏，只有十全十美的圣徒或者对圣洁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才能这样自我陶醉。我讨厌这类人，也讨厌自己，终于我理解到，这种信仰是骗人的。

奇怪的是，虽然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信仰有多虚伪，并且抛弃了它，但是这些人给予我的称号——艺术家、诗人、导师的称号我没有抛弃。我天真地想象我是诗人、艺术家，我能够教导一切人，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教什么。我就是这样做的。

由于与这些人接近，我沾染了一个新的弱点——近乎病态的骄傲和疯狂的自信，相信我的职责是教导人们，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教什么。

现在回想起这段时间，当时自己的情绪和那些人的情绪（现在这种人还有成千上万），我感到可怜，可怕，可笑，会出现只有在疯人院里才能体验到的那种感觉。

那时我们都相信，我们必须不停地讲话，写作，出版——尽量快，尽量多，认为这一切都是人类幸福所必需的。我们成千上万的人，一面互相否定、责骂，一面不断地出版，写作，教训别人。我们不觉得自己很无知，连最简单的生活问题，即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都不知该怎样回答。我们大家一起讲话，不听对方说什么，有时互相姑息和吹捧，以便别人也姑息和吹捧我，有时则情绪激动，争吵不休，完全和疯人院的情况一样。

成千上万的工人日日夜夜拚命干活，排字，印刷了亿万字的作品，邮局把它们分发到俄国各地，而我们总是说教，没完没了，越来越多，而且无论如何也来不及把什么都教给人家，还要生气，说人家听得少。

这太奇怪了，但现在我完全理解。我们真正的、内心深处的想法是，我们希望获得金钱和称赞，越多越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除了写书和出版报纸以外，其它什么也不会做。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但为了我们能进行这些无益的事业并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还需要有一种能为我们的活

动辩护的论点。因此我们就想出了这样的论点：凡是存在着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存在着的都在发展。发展又都是通过教育。而教育就以书籍和报纸的推销情况来衡量。由于我们写书，出版报纸，人家付给我们稿酬，并且尊敬我们，因此我们是最有教益的好人。要是我们大家意见一致，这种论断当然非常之好。可是一部分人讲出来的想法往往与另一部分人的想法截然相反，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反省。然而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人家付给我们稿酬，我们的同伙夸奖我们，因此，我们，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正确。

现在我清楚了，与疯人院相比较，情况完全相同，那时我只不过模模糊糊地怀疑到这一点，而且只不过和所有的精神病患者一样，把别人都叫做疯子，而自己除外。

三

我在这种疯狂的状态中又生活了六年，直到结婚为止。这时我到了国外。在欧洲生活，和一些先进的、有学问的欧洲人交往，使我对于成为我的生活中心的对完善的信仰更加深信不疑，因为我在他们那里也看到了这种信仰。这信仰在我身上具有我们时代大部分有教养的人身上所具有的一般的形式。这信仰，用一个词来表示，就是“进步”。那时我以为，这个词表达了某种含义。我还不理解，我与任何一个有生命的人一样，为“我怎样才能活得更好”这类问题而苦恼，而如果我回答应该“活得合乎进步”，那就好比一个人乘着任凭风浪摆布的小船，对此时主要的唯一的问题：“往哪儿去？”只会说：“我们正飘向某地”，等于没有回答问题。

那时我没有发觉这一点。只是偶尔在感情上，而不是在理智上，对我们时代这种共同的迷信感到愤懑，因为它被人们用来掩盖自己对生活的不理解。例如，我在巴黎的时候，死刑的景象动摇了我对进步的迷信。当我看到一个人身首异处，分别掉落在棺材里，我就理解到——不是用理智，而是用整个身心理解到，任何一种关于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理论和进步的理论，都不能为这一行为辩解，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根据创世以来的任何一种理论，认为这是需要的，那么我也知道，这并不需要，这很不好。因此，能评判什么好、什么需要的不是人们的言论和行为，也不是进步，而是我自己的心。使我意识到对进步的迷信不足以说明生命的另一个例子就是我哥哥的死亡。他是一个聪明、善良、严肃的人，年纪轻轻的就得了病，受了一年多的折磨，最后痛苦地死去，不理解为什么而生，更不理解为什么而死。在他缓慢而痛苦的死亡过程中，没有什么理论能针对这些问题给我和他作出回答。

但这只不过是偶尔产生怀疑的例子，实质上我继续生活下去，只信奉进步。“一切都在发展，我也在发展；而为什么我和其他人一起发展，日后会见分晓。”那时我应该这样来表述我的信仰。

从国外回来以后，我住在农村，办农民学校。我特别喜爱这项工作，因为其中没有我明显感到的虚伪，而在文学教育活动中，虚伪已经使我感到很不舒服。在这儿我也是为进步而工作，但我已经批判地对待进步本身了。我对自己说，进步的某些表现是不正确的，因而对待蒙昧无知的人、农民的孩子需要完全的自由，让他们选择他们愿意走的那条进步的道路。

其实，我仍然围着那个原来的难题打转转，即要教育人，但

不知道教什么。我在文学界的上层看得很清楚，不知道教什么是无法进行教育的，因为我看到，大家教的内容都不相同，彼此之间进行争论无非是为了不让自己看到自己的无知。可是在这儿，和农民的孩子在一起，我想我可以避开这个难题，让他们学他们愿意学的东西。现在我想起我为了满足自己教育别人的欲望而支吾其词就感到可笑，其实当时我内心深处非常明白，我不能教给别人一点有用的东西，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有用的。办学一年之后，我又一次出国，企图了解怎样才能做到自己一无所知而又会教育别人。

我觉得，我在国外学到了这种本事。在掌握了全部奥妙之后，我便在解放农奴的那一年回到俄国，担任调停人的职务，同时在学校中教育没有文化的人和出版杂志教育有文化的人。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我感觉到，我的理智并不完全正常，这样下去是不能持久的。当时我很可能陷入绝望的境地，就象我五十岁的时候那样，如果缺少了我还没有体验过、并且能使我找到出路的人生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家庭生活。

有一年光景我从事调停人的工作，办学校，出版杂志，尤因漫无头绪而疲劳不堪。我为调停中的争执而苦恼，我的办学事业方向不明，我讨厌自己在杂志上的影响，这种影响无非是老一套——想教育大家并掩盖自己不知道该教什么，结果我在精神上病得比肉体上更严重，于是抛弃了一切，跑到巴什基尔人的草原上去呼吸新鲜空气，喝马奶，过着动物一般的生活。

从那里回来以后，我结了婚。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新环境已经使我完全撇下了对生命的总目的的任何探索。在这段时期，我的全部生活都集中在家庭、妻子、孩子，以及如何增加生活资料方面。对完善的追求早已被对一般的完善和对进步的追求所

代替，而现在又赤裸裸地被追求我家庭的幸福所代替了。

就这样又过了十五年。

尽管在这十五年间，我认为创作毫无意义，我还是继续创作。我已经尝到了创作的甜头，尝到了微不足道的劳动而换取大量稿酬和赞赏的甜头，于是我全力以赴，把它作为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和抹杀内心存在的关于自己的和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目的的任何问题的手段。

我创作，以我所认识到的唯一的真理，即应该活得使自己和家庭尽可能地幸福，来教育大家。

我这样活着，但是五年前我身上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起先，我有些迷惑不解，生命停顿了，似乎我不知道我怎样活着，该做什么，我惶惶不安，心情抑郁。但这种时候一过去，我还象原来一样活着。后来，迷惑不解的时刻越来越频繁，而且总是具有相同的形式。这种生命的停顿常常以相同的问题表现出来：为什么？那么以后会怎样？

起先我以为，这不过是一些无目的的、不恰当的问题。我以为，这一切并不新奇，如果我有时间而且愿意解决这些问题，那并不需要花费很多气力，现在仅仅是因为我没有时间来考虑，要是我愿意，我一定能找到答案。但是这些问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回答，这些缺乏答案的问题，就象一颗颗小点子落在一个地方，聚集成一个大的黑点。

出现了象每一个内部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身上常见的现象。起先只有一点儿不舒服，病人也不很注意，后来症状日益发展，变成了一种无休止的痛苦，痛苦日益加剧，不用多久，病人已经意识到，他原先认为是小毛病的征兆，对他来说竟是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这就是死亡。